

#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文学馆收藏的沈从文手稿 □刘 屏

在沈从文那高2.8米的五彩石墓碑背面,刻有张充和撰联并书的16个字:“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应是沈从文人生和创作最精辟的写照。巴金说:沈从文是他最佩服的三个最有才气的作家中的一个。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手稿不少,且不乏大家名家的,惟沈从文的手稿不多。据我所知只有两部:

一部叫《跑龙套》,是一篇3400字的散文,用毛笔竖行书写,字迹工整娟秀,曾在1957年《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过。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说:“为避免滥竽充数的嫌疑,我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喜欢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干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扎实些、沉重些。这些文字体现出沈从文坦直率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和心态。

另外一部是关于鼻烟壶的,没有篇名,是我国鼻烟壶内画的工艺美术大师王习三2002年春天捐赠给文学馆的,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王习三原名王端成,1938年5月出生在衡水阜城县,1957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分配到内画组,在京派内画艺人叶祺和叶晓峰门下当学徒。王习三熟练掌握了“叶派”内画技法,初步形成了厚朴古雅、浑厚大气的京派内画艺术风格。出徒后调北京工艺美术厂搞内画创作。正当崭露头角之时,“文革”来临,他被遣返原籍。在衡水阜城老家的岁月里,他没有放弃喜爱的内画艺术,逐渐形成了浑厚高雅、轻盈飘逸的冀派内画艺术风格。1979年8月,王习三作为冀派内画艺术的创始人,在北京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及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和沈从文分在一个小组。小组讨论时,沈从文发言提到了故宫的精美工艺品和早年藏品失窃的事(包括鼻烟壶),引起了坐在旁边的王习三的兴趣和好奇,他很想了解更多宫内有关鼻烟壶的情况,沈老讲完,王习三想向他请教,又怕打扰别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便笺写道:“沈老:请您把上次讲的关于‘盗鼻烟壶’之事的大约时间、地点等情况简写一下。”之后递了过去,于是,沈从文使用流畅潇洒的文笔给了详细的解答。这份珍贵的手迹一共6页,王习三珍藏了20多年,2001年两会期间,王习三和部分政协委员前往参观了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现代文

读沈从文的作品,就让人想起湘西那片热土,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她们之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磨难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但在她们身上,通体闪耀着善良淳朴的人性。其中,少女形象尤其表现得鲜活透彻。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少女为描述对象的作品有《雨后》《阿黑小史》《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三三》《边城》《长河》等,尤以《边城》最为著名。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少女翠翠,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翠翠甫一出场,作品中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在这里,湘西少女翠翠生活在自然中,恬静的生活环境陶冶了少女的性情。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在边城,她的情感自然地涌向傩送,并不因为对方是富有的船总顺顺的儿子,而当大老二老同时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依然选择的是心仪的二老傩送,选择的是悲情的悠悠地等待下去。这种优美、自然的人生,展现出朴素动人的人性,在翠翠身上得到了真实的流露。美丽的湘西大养育出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少女,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那种尊崇自然、敬畏生命、赤诚至爱的民族文化基因,充分体现在他笔下少女身上,更着重体现在懵懂的爱情面前,她们表现出的是矜持

沈从文生前没有出版过专门的诗集,但他于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鸭子》里却有4首诗,即《春月》《我喜欢你》《戕冬》和《薄暮》。笔者于大学期间曾翻阅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记得书中收了由徐志摩、闻一多和卞之琳领衔的“新月18家”,其中就有沈从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沈以小说成名后,由于文品与人品俱佳,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他还利用自己当编辑的便利和权力,不以诗歌为主业的他,却在《京报·国语周刊》《晨报·诗铎》《小说月报》《新月》《水星》《现代评论》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其中大部分编辑权都掌握在新月派的手里。不过,沈写诗并非从“新月”开始。据他自己说,写诗是他“老本事”,十多岁时就曾练过,还被称为才子(1962年1月28日复张兆和函)。遗憾的是,他早年练笔时代的“才子”之作没有留下来。

如果说解放前沈从文发表诗作太容易的话,那么解放后就变得难乎其难。从1962年开始,沈的诗歌创作进入隐性写作状态,自己时不时的写,总量不少,但没处发表。在总篇幅达470页的《沈从文全集》之15“诗歌卷”中,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约有200页,占40%多。他的诗歌创作大略可分3类。1.“土话”诗。2.白话诗。3.旧体诗。

一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写作资源有三类:古典、西方与民间。沈从文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可用的古典资源很有限。1920年代中国的外语和西学教育水平还很低,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出国经历,则无法用西方资源。沈自称“委实没听过什么夜莺”,而“夜莺”正是西方诗歌的象征。对于刚刚出道的沈这样一位“乡下人”来说,只剩一种资源可用,即民间文化资源,他曾用“麻雀”“蝈蝈”和“鸭子”等民间动物作为其象征。他很善于用民间资源,也正是民间资源成就了他。

学馆新馆,感触很深,他觉得由文学馆来保存这份珍贵文稿更为妥善,也更有意义。于是,2002年3月王习三亲手把它捐献出来。

沈从文这篇文稿写在“河北省衡水地区特种工艺厂便笺”上,内容很是精彩,这里不妨摘录一段:

我注意的,只是鼻烟壶(所谓料壶)仿翠玉的成就,因为涉及玻璃发展史的问题。以平板玻璃而言,到乾隆时还不曾普及,主要似乎是加工过程必需吹大再加热碾平,再镀水银。但较大的金鱼缸,则已能生产,不仅《红楼梦》上提到,我还有机会见过。当时不过四元钱即可得到。式如下(沈从文在此画一小鱼缸图——笔者注)约一尺径近磨料,因为不是一般平板玻璃,是加工磨成小冰片而成。至于玻璃珠子则三千年西历已出现。战国已大量生产。东晋才发现吹成瓶类,隋才正式生产瓶子类(李静训墓出土),但唐代正式设官(在甄官署下设局局),专烧五色玻璃珠装饰佛像。到宋还是大量出口品之一。但已有琉璃碗,照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均提及。技术上似仍不普及,所以明代宫中才大量制造“明角玻璃灯”。不太透明,但较结实。宋元重点都用在作假玉假宝石,清代则普及大量用到官府顶戴上。鼻烟壶较可能造办处烧造,作为赏赐用,记载相当多。但逐渐转为皇亲贵戚手头欣赏品,争奇斗胜,如汉人对于带勾的说法“宾客满室视勾各异”,因此各个料壶的品种,千奇百异,造办处以外,苏杨广都有新产品出现。但在加料上却彼此保密,在品种上为进展,在技术上则因保密而失传。

只上面一段文字已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功底,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仿佛探囊取物信手拈来,绝非一般的文学家或文物专家所能比及的。

在这篇文稿里,沈从文提出了许多历朝历代可以引为内画题材的图谱、名画资料线索,如“赤壁图”、“兰亭雅集图”、“唐人夜乐图”、“唐宋明人打马球图”,以及几十种儿童画类,还有黄庭换鹅、陶靖节种菊、周敦颐爱莲图、周处斩蛟图、西园雅集图等等候王习三参考。如借鉴用到内画鼻烟壶上都会有新意效果。沈从文还告诉王习三:自己曾过手上千种鼻烟壶,许多是在东安市场买的“处理

##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

□胡 磊

而又真诚的品性。最为典型的特征是苗族少女以对歌表白爱情的形式,这种在土家族、苗族青年男女中广泛流行的传情方式,淳朴自然,将一切美妙的话语都寄托在歌声里。作品《萧萧》中,萧萧的真正爱情诞生在花狗的歌声中。《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傩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都写到青年男女的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长河》和《三三》中,天天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表露出对新生活的憧憬,而这种向往似乎与凡世的物欲无关。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生命的自由支配寄托了他对自然人生的礼赞。

这样的礼赞也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文化意义上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在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上得到充分体现,融化在湘西那片原生态般的苗族风俗与乡村生活交融的河流中,是湘西的温柔之水给了沈从文灵性,他便把少女的灵性重新嫁接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女们,她们长得水灵,却从不缺乏内心的坚韧。《边城》里的最后“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绒

沈之所以大用特用民间文化资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家乡条件所造成,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他到北京来学习时正好赶上北京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歌谣搜集运动。而早在1918年春,北大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布了一则详细的声明,动员全校的教授、职员和学生参与搜集活动。北大的这一活动固然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对他创作诗歌创作的影响更直接、更致命。歌谣运动中最积极、最成功的实践者是刘半农和顾颉刚。1919年8月,刘半农在由其家乡江阴北上的途中,向船夫采得20首吴语情歌,回北京后,马上编为《江阴船歌》。刘还模仿这些民谣,创作了一批民谣体诗歌。沈正是借鉴刘半农他们的做法,一边搜集民谣,一边开始他的诗歌创作。他搜集的是家乡“镇竿”(今湖南凤凰县)的歌谣,他称之为“镇竿”土话,并解释说,那是“苗民杂处几同化外之土边镇竿地方土话也”。沈共搜集了两组“竿人谣曲”,前一组是“单歌”,共42首,分两期发表于1926年12月27日和29日的《晨报副刊》。后一组是“对唱”,共8首,发表于1927年8月的《晨报副刊》。对应于前者,沈创作了《乡间的夏》《镇竿的歌》《初恋》和《还原——拟楚辞之一》;对应于后者,他创作了《春》。

沈早年创作的民歌是自身条件局限和受到谣曲风潮影响的产物,是他自己的一种新尝试(他说是整个诗坛的新尝试,则掩盖了刘半农等人更早的努力)。从文本上来说,在1920年代的语境里,那些拟民歌可以看作诗歌的试验品,但不是诗,更不能说是成功的诗。因为,民谣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方言,二是乐曲。方言离不开当地的环境,乐曲则必须让人唱出来。沈在北京用他湖南老家的方言写作民谣,既离开了方言的环

## 经典作家专刊

品”,很便宜。有朋友带到英国,有些还上了英国的鼻烟壶杂志。

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名为《沈从文转业之谜》的文章中说,沈从文之所以能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他“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沈从文对文物产生兴趣要早于对文学的兴趣,年轻时在一个统属官身边作书记时就接触了大量的古瓷字画碑帖铜器等,这颗“棋子”对他后半生转而研究古代文化文物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形势迫他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之路时,他选择了文物研究。离开文学界后,沈从文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告别了喧闹的文坛,潜心于古代历史文化的海洋,让他在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斐然成果。留下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

进入文物界后,沈从文曾几次有机会重返文坛。1953年他作为美术组代表参加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在询问了他的工作身后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从文只以微笑作答。1958年,他参加了一次宴请文艺界人士的宴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也曾想请沈从文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被他婉拒了。上世纪60年代初,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曾想以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事迹为创作原型,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在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他已经开始深入生活,构思故事,终因难以割舍文物研究和无法面对当时的客观环境而放弃了。远离文坛种种,潜心文物世界,这一选择让他的内心既痛苦又轻松。

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一颗炽热真诚专一的心,是沈从文在几个领域都能取得斐然成就的最大要素吧。沈从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愿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他人铺路架桥,“为各方面打打杂”。从王习三捐赠的沈从文文稿上,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最后还想顺便提一句,文学馆还收藏有沈从文的十几封信,都是写给作家的,其中写给巴金9封,给巴金夫人萧珊1封,给丁玲2封,给沙汀1封,给师陀1封,给林涓1封。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信都是收信作家本人或亲属捐给文学馆的,写信的时间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打倒“四人帮”前后两个时期,这也正是沈从文人生历程中“改行”和“归队”的重要年代,从这些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当年离开文坛的因由和30年后重返文坛的心境,是研究沈从文现象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

□胡 磊

……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继续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二老。倔强的少女三三“好像不曾听到这个话,站起身来又跑出去了”。沈从文将烂漫多情、耽于幻想、本性率真的自然秉性全部赋予在了湘西少女身上,她们身上充盈着隐忍、悲哀、茫然,或喜或悲、或爱或憎,在封闭的湘西世界里,她们悄无声息地生,默默无闻地死,对生活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朦胧的想象和默默的反抗与承受之中。沈从文对少女追求自由的人性表示了深切的悲悯。沈从文的作品富有如此的生命力,其中独特的自然美和奇特风情来源于湘西一带楚巫文化余风。楚文化包含着巫风的独特精神文化风貌,从楚辞中就能透出楚国人民天真浪漫、崇尚热情自由的个性。沈从文的笔下,举凡经典的形象必是源于洒脱自由的灵魂,其不羁的行为中伴随的是真诚热烈的情感。他对湘西少女的爱恋采取的直接面对的态度,以肯定人的本性、肯定追求自然淳朴的爱为前提。少女的爱情在这裡被诗化,这爱中带着坚韧执著,伴随着神性与魔性的人性内容,成为一种生命元气强盛和人性健全的象征。

## 沈从文的诗歌创作

□北 塔

境,又缺乏乐曲的支撑,当然要失败。至于“拟楚辞”云云,恐怕是源于沈的另一层误解。“楚辞”是屈原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创造的一种诗体,已经高度文人化了,已经远远不是民谣。沈的“拟楚辞”与民谣也隔了两层。问题是,沈还死死地想要留住那种话语方式、那种调子,最终显现出来的必然是两头没有着落的状态。尽管他刚刚写完时,曾兴致勃勃地自诩说,那些拟民歌“新鲜、俏皮、真挚”;这三个特征表面上是实现了,但却不能保证作品的丰富内涵,况且,用白话或文言也能写出这三个特征。也许是沈自己也觉得这种模仿民谣腔的写作没有前途,甚至无趣,很快便放弃了。

但他写诗的冲动却无法抑制。他开始向周遭学习。当时,占领北京诗坛的是新月派。而沈与新月诸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层关系使他的诗歌创作走上了正轨,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具体时间大概是在1925—1928年。这类诗尽管比较多地模仿了徐志摩和朱湘等人,如《春月》和《其人其夜》因其强烈的音乐性追求,可以放在朱湘的诗集里;当然,这也可以看做是沈本人的民歌倾向的一种转换。民歌资源的另一个内在影响是爱情诗的多产,因为绝大部分民歌都是情歌。沈本人也是情感型作家,他的文字主要靠情感取胜。另外,这时期他正值欲望强烈、追逐爱情的年龄,所以颇写了些爱情诗,有的写得很巧妙、深情款款,如《我喜欢你》云:你的聪明像一

北京,一座承载着太多历史文化的古城,无数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离开湘西老家,只身来到北京求学,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他坚定的文学信仰。正是这份执著打动了北京城。

### 西会馆

1922年夏,沈从文初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他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虽没给予物质资助,但送给他一句很受用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正是这句话支撑着他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西会馆(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遗产,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一种给养与交流的纽带),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位远房表哥,他得以搬进会馆白住。

只有高小文化的沈从文,未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只好放弃愿望,开始自学。每日两三个馒头,一点泡咸菜便是佳肴,走出会馆,直奔宣武京师图书馆,两点一线。入冬,气温骤降,他仍薄裤单衣寒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还有《史记》等相随左右。那时,他也尝试写点小稿,本想换取三五元稿费,奈何挣钱不得,却招挤兑。每次去报社,门房都要索取一两毛钱小费,也许因为他太寒酸吧。那些日月,沈从文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 银闸胡同公寓

因会馆只提供乡友暂时居住,沈从文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农大读书的表弟帮助他搬进了银闸胡同,这所公寓毗邻北京大学红楼。红楼附近公寓众多,栖居着各地学子。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北大校门向所有人开放,沈从文顺理成章的成为不注册听的旁听生。国文、日语、历史、哲学课等,这份权利与自由令沈从文欣喜若狂。然而他仍然想成为一名正式学生,取得大学毕业证书。1923年秋天,他曾参加过北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人学考试。但终因一问三不知而落榜。至此,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写作。

然而,他投出的稿子,篇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沈从文并没有气馁。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社会改造必须从文学革命开始。可是再美的梦想也难奈身上仅剩的几块钱,仅有的两条棉被。一天,饥饿难忍的沈从文差点就在天桥上参军入伍,只因按下一个手印便可领到饭费。幸有姐夫那句忠告,饥饿最终没打败信念。

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向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这一次终于没有落空,他得到了郁达夫的帮助与鼓励。此后,他不懈的努力,几个月后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道夜》。这篇文章被北大教授林宰平看到,他被这个年轻人坚定的信念打动,遂介绍一份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

### 香山慈幼院

迎接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沈从文来到香山。最留恋处莫过于香山“听法松”旁的山石,他与好友董景天、陈鹤翱常在此谈文论学、谈人生、谈神仙鬼怪,偶来雅兴,还会从屋里抱出一面琵琶,用刚学的蹩脚手法,弹奏一曲。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胡也频、丁玲,却因机缘在这20世纪30年代初遭遇与两位挚友的死别、生离,成为一曲文坛悲歌。

1924年12月,沈从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5年至1927年,他的作品频繁见诸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福生》《更夫阿韩》《堂兄》《黎明》《哨兵》《十四夜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致170余种。

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装作成如此沉默。

有的赤诚而肉感,又不乏奇思妙想、奇譬妙喻,绝类“香艳体”,如《颂》云:说是总有那么一天/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沈从文另一类写得让人叫好的诗是具有杂文风格的讽喻之作,如《到坟墓的路》和《余烬》这两组为代表,往往能以寥寥数行活画出一个形象的丑陋或一种现象的荒谬,充分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如《艺术》云:无耻的荡妇,/臀部圆鼓的波动,/把诗人眼睛吸住了,/于是,/诗人就梦波似的,唱起歌来。

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幻异”或“灵幻”的抒情色彩,这是他相当自豪的才能。这种才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组诗和长诗中,如《第二章——第三章》和《从贝多芬乐曲所得》等,也有优异的表现。他的小说才能,在叙述和描写方面,在诗歌中也用得相当普遍。有些地方显得太普遍了,以至于有违简练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嫌疑。

文学家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后成了文物专家。要研究文物,必然要多读古书。可能就是因此,沈创作旧体诗的兴趣突如其来,而水平则突飞猛进。

沈的旧体诗创作肇端于1961年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属于集体创作。时间是从1961年冬至1962年春,即在江西采风时期的4个月。因为是官方组织的采风之作,有过于重政治之嫌,“缺少文笔固有的幻异抒情特

## 沈从文在北京

□郭瑾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沈从文因发表了 two篇讽刺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拂拂》和《棉袄》,得罪了慈幼院的教务长,最终他只得上山。离开香山后,沈从文先后担任了《现代评论》的发行人和冯玉祥部秘书处的办事员。香山是沈从文迎来第一线生机的地方,同时也是令他备受屈辱的地方,以致很多年后他都不愿再踏进香山一步。

### 西城达子营

1932年夏,杨振声、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职务,回到北平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次年9月,他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婚礼很简单。婚后两人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在此期间,沈从文创作了小说《虎雏》《猎人故事》《厨院》《如蕤》《月下小景》《阿黑小史》《八骏图》《新与旧》《主妇》等,中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文论《废邮存底》《烛虚》等。他一生的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

这时,他因小说成就而闻名,结识了许多文友,有凌叔华、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废名、何其芳、芦焚等,他们常举办小型聚会,有时在达子营,有时在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大家因文学观念相近,渐渐形成京派作家群。《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的创作重镇,沈从文逐渐成为核心。京派文人虽住在北京,但其创作大多并不解说北京,而是表现中国的乡土,偏僻、原生态的边地生活方式。其中《边城》最具代表性,抒写古朴自然的湘西。小说中蓬勃的自然生命状态与都市生活的虚矫相对立,勾勒了一个纯美的边地世界。此时此刻,北京城已正式接纳了这个“乡下人”。

### 东堂子胡同51号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文物、古代服饰的研究。此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院,原本有三间房子,但“文革”时被他人占去两间。

1971年冬,沈从文因病特准从干校返京后,就定居在这间小屋里。年近古稀的他,在简陋的房子里,从南州到清明,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各朝各代文物图样,大小不等的说明纸条、卡片悬挂在墙壁和窗栏上,与地上摆满的各种图册交相辉映,不管不顾地写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这一书包括数百幅实物图像,近20万说明文字,先后增补修订数次,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它的问世成为学术界一座文献瑰宝。此外,沈从文对文物也颇有研究,还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著作。

### 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

沈从文先命最后的日子,是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的寓所中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住过的最舒适最敞亮的房。他的表侄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里记下了沈从文最后的生命路程:“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从西会馆、银闸胡同到崇文门东大街,匆忙66载春秋,见证着北京城的历史沉浮,也见证着外乡人在北京的路。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到北平《大公报》《经纬报》《益世报》和《平明日报》四大副刊编辑,沈从文除培养集结了一批受新文化感召的青年人外,自己一生创作结果约有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的文字与信仰,与这座城以独特的形式交汇,现代性与淳朴乡情精心交织出一个令人向往的湘西世界。

最后,又想起黄永玉的那句话:“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征”,基本上是歌德派的内容和风格。此一阶段有20首左右。

第二个阶段突出的是自然,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2年夏到1963年10月,他自己前往青岛休养,前往广东和广西游览,移情于大自然,优游于风景。共有17首左右。

第三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但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8年至1970年夏,即在牛棚期间和“五七”干校的初期,这是沈一生中最为难的时期,但他诗中没有愤懑和怨恨,有的是革命热情和自得其乐。约有25首。

第四个阶段突出的是文化,属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70年秋至1975年,即在“五七”干校后期。他用诗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否在模仿杜甫,要做当代“诗史”?)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沈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史观严重依附于毛泽东和郭沫若。如,他曾参与批孔。有17首左右。

沈对自己的旧体诗创作一开始非常自信,甚至自信到有点固执。他一方面批评别人,说“看人到处题诗,都极俗气的堆名词、情、理、境三不高,还做到写到处送人、发表”;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捧得很高,如他说他的《庐山含鄱口望鄱亭》“也写得极好”(1962年1月28日致张兆和函)。“极”字是否意味着这首诗可以其他与《唐诗三百首》媲美?“也”字暗示着他的其他诗也是“极好”。有人(如他的夫人张兆和)“奉承”他,说他“确有些老杜风”(1962年1月12日沈从文致张兆和),他特别受用。其实,他的诗歌渊源走的是汉魏五言诗、陶渊明和白居易这条线。无论从精神内涵还是修辞技巧而言,都离老杜甚远,当然这并不影响沈在诗歌抱负上追慕老杜。老杜号称“诗史”,他呢,写起抱负高远,企图写“中国文化史诗”。然而,他的“史诗”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以诗证史——以诗歌的形式罗列史实。